

嬴秦西垂文化

——甘肃秦文化研究会首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雍际春 田佐 南玄子 / 主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赢秦西垂文化：甘肃秦文化研究会首届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 / 雍际春，田佐，南玄子主编. — 兰州：甘肃人
民出版社，2013.9

ISBN 978-7-226-04496-4

I. ①赢… II. ①雍… ②田… ③南… III. ①文化史
—甘肃省—先秦时代—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K294.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12569号

责任编辑：肖林霞

封面设计：王林强

赢秦西垂文化

——甘肃秦文化研究会首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雍际春 田佐 南玄子 主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甘肃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20.75 插页4 字数340千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 978-7-226-04496-4

定价：58.00元

编委会

主 任 祝中熹

副主任 赵双龙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建营 马世峰 王 刚

田 佐 田炫宏 张亦非

程建荣 南玄子 赵旭东

独小川 蒲刚青 雍际春

魏士元 魏安民

主 编 雍际春 田 佐 南玄子

序

祝中熹

2012年9月,在阳光灿烂的金秋季节,甘肃秦文化研究会庄严诞生;几乎与此同时,甘肃秦文化博物馆也隆重揭幕。堪称珠联璧合,鸾凤齐飞。甘肃文化事业进程中的这两大盛举,同现于礼县,不仅对秦史、秦文化研究具有深远意义,也在礼县历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秦文化研究会是个学会,而学会的基本宗旨就是以学会友,目的不外乎是为追求有关知识的人们提供一个交流、研讨的平台。所以,研究会成立伊始,便举办了一次关于秦文化的全国性研讨会。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论文集,就是这次研讨会的具体成果。

20世纪90年代,礼县大堡子山秦公陵园及圆顶山秦贵族墓地的发现,揭开了厚重的岁月积尘,再现了嬴秦在汉渭文化圈内崛起的那段历史。这不仅在文化考古领域填补了一片不小的空白,也为华夏文明整体构塑找回了一个重要环节。学界对嬴秦早期遗存的关注迅速升温,从而把秦史、秦文化研究推向了新阶段。不同规格的学术聚会陆续举行,各种形式的学术论著纷纷面世,更大范围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也随之展开。与此相应,探究区域性古文化沉淀的风气也蓬勃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激扬了地方文化事业的繁荣。这是甘肃秦文化研究会产生的社会背景,本文集内容即鲜明地流闪着这种背景的光影。

新中国成立以来秦史、秦文化研究最突出的特色,是文献记载与物质遗存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田野考古资料信息的日益丰富,以及对传世秦器阐释水平的不断提高,极大地推动了这一领

域的学术进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秦史、秦文化研究的每一次热潮,几乎都是在物质文化遗存新发现的激发下掀起的。诸如上世纪70年代秦始皇兵马俑的重见天日,宝鸡太公庙秦公钟、镈的面世,秦公雍城陵园的逐步揭示,80年代云梦睡虎地秦简及青川秦牍的出土,甘谷毛家坪秦文化遗址及天水放马滩秦墓的发掘等,都曾引起学界的热烈讨论,频频扩展着秦史、秦文化探讨的视野,增强着研究的力度。礼县秦文化田野考古所引动的学术热潮,实为上述文化趋势的大幅度延展,而且具有令人兴奋的持续性。文献记载同物质遗存密切结合这一特色,在本文集中有突出反映。许多作者都在围绕嬴秦物质文化遗存申证立论,更有多篇直接介绍、阐述秦文化田野考古的文章。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2004—2007年间,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国家博物馆考古部、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五家单位组成的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又对以礼县为重点的西汉水上游地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查和发掘,收获丰硕。尤其是对大堡子山城址和西山坪城址的考察,对大堡子山秦陵乐器祭祀坑和鸾亭山祭天遗址的发掘,对周秦文化遗址群和寺洼文化分布情况的探寻,为学界正确认识嬴秦在西汉水上游地区的活动,进一步研究秦早期都邑地望及西峙所在,确定西垂陵园墓主及寺洼文化性质等重大课题,提供了许多新的资料和线索。这方面的情况,联合考古队所撰《早期秦文化项目在礼县工作的重要收获》一文,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对大堡子山秦陵出土器物感兴趣的读者,不妨读一下赵化成、王辉先生的文章,该文向我们提供了陵园流散器物较翔实的信息。

我们强调田野考古对秦史、秦文化研究的推动,决不意味着对传统史学的轻视。正如人们常比喻的那样,这二者是鸟之两翼,车之双轮,不可或缺。没有物质文化遗存的充实和印证,传统史学将因缺血而苍白虚弱;脱离了传统史学构架的引领和辨识,物质遗存

便只是一些散乱的物象堆积。历史学与考古学的有机整合问题,向来为学界所关注,这方面的探讨从来没有停止过。过分依赖文献记载,将考古发现与之盲目对号;过分尊信考古资料,怀疑乃至排斥文献记载。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都应当极力避免,此已为学人之共识。毋庸讳言,在学术实践中将二者完美地融为一体并不容易。考古学家往往习惯于从实物出发,而历史学家往往习惯于从文献出发。但这没有关系,只要大家都抱定实事求是的原则,以构筑中华民族完整历史为共同方向,一定会做到彼此呼应,相辅相成,如同生物基因的双螺旋结构,组合成共有的学术生命。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都面临一个阐释学问题。文献记载的浩瀚内容,必须经过解读、梳理、考释、选择,才能转化为史事表述的依据。这是个复杂的阐释工程,需要考古资料的支撑和验证。物质遗存所负载的文化信息,必须经过整理、辨识、揭示、评析,才能转化为历史构塑的材料。这同样是个复杂的阐释工程,需要传统史学的指导和辅助。总之,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应当或者说必将在历史阐释的大道上携手并进。台湾著名史学家汪荣祖先生称历史阐释为“史学之重镇”,说“史家之功力也最见之于阐释”(《史学九章》,三联书店2006年,第196页)。确为睿识灼见。

就以近年面世的清华战国简《系年》来说,对于先秦史研究领域,其重大意义自不待言。所涉内容有些和已知的古籍记载一致,更加坚定了学界对那些记载的信赖;也有些内容同已知的古籍记载相违,引起学界对某些史事的重新思考。《系年》既是考古实物,又是文献资料,如何对待它,就存在一个传统史学与物质遗存切实结合的阐释问题。应清醒地认识到,《系年》毕竟只是战国时期人们对我国古史众多杂说中的一种,既不能轻易否定它的可信度,也不能未经鉴别便全盘接受。必须把它纳入现存的古史认知构架内,通过与其他相关资料的参照分析,权衡其来源和性质,肯定其可靠成分,否定其虚妄成分,考辨其可疑成分。对此,张天恩先生《清华简

〈系年〉的秦初史事略析》一文,即颇能起示范作用。《史记·太史公自序》讲《史记》的撰写宗旨不同于《春秋》:“余所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这告诉我们,当时关于古代史事即“故事”,社会上存在许多说法即“世传”,司马迁给自己定的任务是“整齐其世传”,即对已知史料(包括文字和口传)加以鉴别、梳理、选择,构成合理的史事体系。当然,司马迁的“整齐”完全可能有失误,但《系年》就不可能有失误吗?所以我们说,仅凭几支战国简文便否定《史记》的记载,是不够审慎的。周初飞廉余众被迁至陇右朱圉山一带,当为史实,因为有另外的文献记载及田野考古可作辅证;但由此就说这是秦人的“始源”,则失之武断,因为没有证据表明《史记》所言商时一支嬴族已在陇右生活是错误的。依笔者愚见,飞廉余众之所以不迁他处而远徙陇右,正是因为飞廉的主族早已经在陇右活动,并建立了一个小方国。张天恩先生文章中指出《系年》的那些显性错误,也提醒我们对其史料价值的判断,应持慎重态度。

本文集另外一大特色,是民俗文化备受重视。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民俗文化的发掘同秦文化研究的内在联系,开始把学术目光扫向民俗文化领域。民俗文化具有地域性和历史性,是不同地区的人民大众在其所处的特定人文环境中,经过世代相继的陶冶和传承而发育起来的乡土风情;而其最初的胚胎,大都缘自某些历史因子,包含地域特色的历史文化沉淀,是其成长的土壤。民俗文化洋溢的旺盛生命力,其实就是历史的生命力,所谓文化传承,只能在大众生活的血脉里流淌。田野考古和文献记载均明确告诉我们,汉渭文化圈即以陇山为依托、以天水为中心、汉渭二水支流毗邻的这片区域,是嬴秦的崛起之地。它南含礼县、西和,西涉甘谷、武山,北至清水、张川,东达汧渭之间。域内经历过嬴秦的长期开发和治理。这一无可置疑的史实,在民俗文化中寓含其影迹,应属合情合理的社会现象。即以“乞巧节”言,粗看起来,似与嬴秦历史没有什么关联,但经过学者们的探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实情,却是二者的血

脉相通,渊源昭然。赵逵夫先生《汉水与西礼两县的乞巧风俗》一文,即非常有说服力地揭示了这期间的文化经络。读了他的文章后,你不得不承认,牛郎织女这个美丽的故事,最早就是在嬴秦活动地区诞生并流传的,故事中隐含着秦文化许多基本要素诸如嬴秦族源、鸟始生神话、部族特性、生活区域、与姬周的关系等信息。“七夕”也即“乞巧”节,至今在汉渭文化圈最为兴盛,最受重视,绝非偶然。

一种学术的发展,沿着传统趋势呈线性推进,固然是主体性旋律,但这并不排斥对多元因素的横向吸收和借鉴。在包含秦文化在内的先秦史研究领域尤其如此,学术活力依赖于多学科交叉。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神话学、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学以及这里正在强调的民俗学,都在先秦史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关键是研究者要善于识别,把握民俗文化中所蕴藏的真正历史因子,并通过严肃的论证理清其社会生活中的流变轨迹,而不是只凭主观想象去做史事的架空对接。

我们欣喜地看到,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秦史、秦文化的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步。研究队伍空前壮大,质量也在不断提高;包括田野考古信息在内的大量新资料,被发现和利用;以各种论著形式展示的研究成果,琳琅满目。这些宏观层面的兴旺气象,大家有目共睹,无需详述。单以早期秦文化这个小范围而言,许多微观课题上的扎实进展,就很振奋人心。如嬴秦族缘问题,图腾崇拜问题,考古文化特征问题,族体活动所涉地域问题,早期都邑名称问题,秦周关系问题,秦戎关系问题,重要器物铭文释读问题,等等,以往曾经模糊过、误判过,或者异说纷呈,争论不休。如今已变得线条清晰,是非分明,学界主流认识已经趋同。

已取得的成绩,在增强我们继续前进信心的同时,也提升了探索研究的高度和难度。一些长期未获解决的老课题,显得更加醒目;大大开拓了的学术视野,又将一系列新课题摆在了我们面前。

比如说,嬴姓部族由东方迁移陇右,是什么时候?是一次还是多次?迁移动因是什么?比如说,嬴秦早期活动地域虽已大致确定,但其最早的中心在哪里?后来有没有转移?转移的时间和顺序如何?比如说,大堡子山秦公陵园的墓主究为何公?乐器祭祀坑的主祭者“秦子”究为何人?其与大墓墓主是什么关系?诸多青铜器铭中的秦子是否为同一个人?比如说,圆顶山秦人墓地范围有多大?其性质如何?是否即嬴秦第一处国人墓地?比如说,秦都“西”邑及“西新邑”地望在何处?襄公所立“西峙”及献公所立“畦峙”位置何在?鸾亭山大型祭祀遗址是否就是“西峙”?比如说,陇右分布甚广的周、秦文化如何区分?与周秦文化邻接乃至交错的寺洼文化是否就是犬戎文化?寺洼文化是一种外来文化还是土著文化?比如说,嬴秦考古文化呈现的西首葬、屈肢葬以及大量使用玉圭、石圭的葬俗,反映了怎样的宗教观念?是不是他种文化影响的结果?类似课题还可以罗列一些,它们的分量都相当沉重,要得出服众的答案绝非易事。这一道道学术高栏,正有待于我们以顽强的意志和务实的精神去跨越,去征服。

和许多此类著作一样,本文集也存在歧见异说同出并存的现象。面对同一个问题,作者的认识有时相距甚远。这其实十分正常。学者们从各种角度观察,沿着独特门径求索,形成多元观点的碰撞,才能使问题更加清晰,才能产生新的启示,才能取得学术的整体进步。刘歆说过“才非交不用,名非交不发,义非交不立”的话,我理解他所说的“交”,指的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交往、交流、交织、交锋。学者之间的交往和思想交流固然重要,知识的交织和观点的交锋也必不可少。不同的观点和认识,可以互相借鉴,互相渗透,互相滋丰;即使有竞争和排斥,也能形成某种文化张力,迸发出真知的火花。正如庄子所言,“知出乎争”。

我们欣赏文化园囿里的群芳竞艳,我们提倡学术研究中的百家争鸣,但我们同时也反对抱残守缺、障目塞听、固执门户之见,而

置正确判断于不顾。实事求是、服从真理的治学态度是绝对不能丢弃的。虚妄错误的东西,在交流、争论中被不断扬弃;坚实可信的东西,在交流、争论中被逐渐认同。这应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态。前文所述新时期秦文化领域取得的那些进展,不就是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吗?我坚信,业界的朋友们在治学生涯中,定能走立实求真、弃谬尚正这条康庄大道的。所以,不必担心争议纷繁、久无定论,那是智慧之果未成熟前难以避免的现象。高明的认知,将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最终被人们所接受。王国维先生云:“凡说之合理,久之必得其证。”信哉是言!

癸巳年春草于古密州

目 录

论秦史研究与秦人西迁问题	赵逵夫(001)
关于西汉水上游寺洼文化的族属问题	刘光华(010)
嬴、赵姓氏缘起析述	祝中熹(019)
天水“两河流域”秦早期文化遗址的发现及其意义	雍际春(035)
清华简《系年》的秦初史事略析	张天恩(040)
秦人早期在甘肃的活动	李清凌(045)
嬴秦西迁考述	王学理(052)
测天、土圭、八卦、西汉水、成纪、秦人	田 佐(061)
秦国初期史的诸问题考辨	杨东晨 杨建国(072)
西垂秦史中几个问题思考	袁智慧(084)
嬴秦先祖三次迁徙西垂活动史事	马建营(092)
东西两犬丘与秦人入陇	王学理(099)
秦早期文化的“中华传统”与秦建国	独小川(109)
陇东南地区先秦时期部族分布的考古学观察之一	魏春元(112)
从《睡虎地秦墓竹简》看秦的重农政策	张士伟(118)
秦襄公的政绩及其历史地位	陈建荣(124)
论秦国责任伦理结构	王兴尚(129)

早期秦文化项目在礼县工作的重要收获

..... 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	(139)
礼县大堡子山被盗秦公大墓流散文物的整理与墓葬归属问题	
..... 赵化成 王 辉	(147)
礼县春秋编钟与《周礼》编钟规定	汪受宽(162)
秦子与秦子墓考辨	吴镇烽(171)
一粟居读简记(四)	王 辉(183)
战国秦东西两大陵区的墓主及形成原因	梁 云(197)
秦兵马俑陪葬坑出土漆器概述	曹 玮 许卫红(214)
“西祠器”铭铜豆考释	马建营(222)
宝鸡在秦人发展史上的地位	高 强(228)
礼县大堡子山秦先公墓补说	高天佑(235)
秦公簋与秦源	赵文慧(243)
中国古代志怪小说的萌芽	黄 英(251)
《秦风·蒹葭》探析	赵远夫(256)
论秦早期文学	蒲向明(262)
“乞巧”民俗为嬴秦民族生殖崇拜遗俗考	田 佐(275)
西汉水流域说春习俗小考	南玄子(284)
论《诗经·秦风》产生的时代、地域	李子伟(292)
甘肃盐官盐神信仰的早期秦文化印迹	赵琪伟(301)
龙马精神成就先秦文化	魏建军(306)
周秦史迹半陇右	马世年(312)
附录	(319)
后记	(320)

论秦史研究与秦人西迁问题

——兼评祝中熹先生《秦史求知录》

赵逵夫

战国末年思想家荀况曾去齐至秦,见到秦昭王与秦相范雎^①。《荀子·强国》中载应侯范雎问荀况“入秦何见?”荀况回答说:

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通“佻”。言不为奇异之服),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桀(音“苦”,滥恶也),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偶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闲,听决百事不留,(清闲,因其百事随时处理,不积压),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侥幸)也,数(必然的道理)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为便阅读,摘王先谦、卢文弨等人注于相关文句之后)。

这是荀况述亲眼所见当时秦国政治、社会、吏治、民风方面的情况,及他的评价。荀况是战国末年集大成的思想家,他既继承了儒家以礼义治国的思想,又具法家思想,又兼采道、名、墨诸家之说,从认识社会的眼光和理论水平来说,在当时无以过之。荀况对当时秦国社会的看法,同后代很多史书中

赵逵夫,甘肃省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①据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荀卿赴秦见昭王应侯考》,荀况之去齐至秦在齐王建元(前264)。

的评价不同。古今的很多著作说到秦多称之为“暴秦”，只看到它在统一六国之中的刀光剑影，及六国志士反抗中的悲剧。屈原的事迹和他的《离骚》等作品是十分感人的，而楚国朝廷中亲秦的郑袖、靳尚、上官大夫，及代表秦国几次到楚国玩弄挑拨离间之计的张仪也是为人所痛恨的。从人的品德及社会公德方面说，应该这样看：郑袖、靳尚、上官大夫作为楚国人而为个人或家族的利益不顾国家前途，应该受到谴责；屈原悲剧的造成也同张仪有关。从屈原和楚国的立场来看，郑袖及张仪等都应受到谴责。屈原是主张由楚国来统一全国的。在春秋战国数百年战乱之后，人心希望统一。战国中期之后有可能统一全国的只有三个国家：齐、秦、楚。因为这三国的背后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齐国东面是海，东南沿海而下可通吴越之地，唯远而难以制约。秦国以西有很宽广的地域，分布着数十个小部族。楚国以南发展的余地也不比秦小。拥有广阔的国土，就有了统一全国的物力、人力上的准备。相较而言，秦国、楚国的条件最好。很多学者论述当时形势都引述“横成则秦帝，纵成则楚王”这两句话，却不知其根本上的原因。秦、楚两国都希望由自己统一全国，秦在商鞅变法之后发展迅速，又用“连横”之策对六国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所以楚国要同齐国等山东五国联合以遏制秦国的向东发展。屈原主张对外联齐抗秦，秦国自然要设法打破山东六国的联盟，使楚国的计划落空。站在客观的立场来说，秦国、楚国都有承担统一全国这个历史使命的资格和可能，只在于哪一个采用的方式更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哪一个的可能更大而已。

说起这两点，屈原主张进行政治改革，实行美政，先统一南方，待条件成熟，再统一北方。这自然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问题是楚国的旧贵族不会轻易地让步，屈原的设想难以实现。秦国则以迅马利剑开路，将一些国家腐朽的贵族制度连同他们的国家一起灭掉了。无论怎样，人们对仁政还是希望的，在广大人民群众对治理国家毫无发言权的封建社会中，仁政也成了人们永久的梦想。就像孔子一生主张仁政，却找不到一个愿意实行的国家，但人们仍以他为圣人加以膜拜一样，人们也永远思念、敬仰屈原，纪念这位为了美政、为了国家牺牲了自己生命的诗人。

很多人对战国时秦国的看法同此有关。但这是两回事，应分开来看。实质上，在战国时的政治改革中，最彻底的是秦国。商鞅虽然被迫害而死，但商鞅变法的成绩保留下来了，所以才会有《荀子·强国》中说的那种吏治状况与

社会风气。至于楚国,随着吴起的被杀,旧制度全被恢复了。其后莫敖子华(沈尹章)、屈原都做过改革的设想或进行了一些改革,但都未能最后成功。为什么秦国的政治改革能够成功?这同儒家思想在秦国的影响较小,“事皆决于法”(《史记·秦始皇本纪》)的法制状况有关。

从思想潮流来说,战国各国大体分三大片:三晋与齐鲁一带,受商周文化影响较深,子夏又讲学于西河,儒学的承传不断,讲仁义,重礼乐。陈、楚及其以南重巫觋、好祭祀,道家思想为主。秦地民性质直,而崇尚气力,虽然儒、道思想均曾有所传播,但总体来说法家一套容易推行,墨家的影响也较儒道为大。《汉书·地理志》中说:天水、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之地,“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同时,由于人民以射猎为先,刚强勇武,也必须有严格的法纪管理才成。清末湖南学者孙楷,湘潭人,遍搜群籍,综覈史册,著《秦会要》一书,其《序》论及秦法,言:

自汉以来,递相沿袭,群以为治天下之具,无外于此;即或更张,而其在者,卒无以相易。

“文革”中毛泽东有《读〈封建论〉——呈郭老》七律一首,中云“百代都承秦政体”^①,或即本于此。只是,毛泽东未能注意到周文化从思想方面影响中国三千多年,从意识形态、思想基础方面统一了全国,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秦在统一全国之后能突破此前数千年氏族分封制的传统,抛弃周代数百年传统的宗法制而实行郡县制,是有很深的文化渊源的。所以,秦国政治体制之影响中国两千多年,应该认真研究。但秦国统一全国前的历史,秦早期的历史、嬴秦的来源,活动情况、文化传统等,也都应该认真研究。但事实上,自古至今,对秦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研究比起对三晋、齐鲁及楚文化的研究来薄弱得多。

关于秦的早期历史,过去学术界虽然也提出过一些看法,但看法很不一致。即如关于秦人族源,虽然《史记·秦本纪》中有些记载,但在战国秦汉时代大一统思想的影响下远古史中很多部族被简单地归到五帝之下,好像华夏各族全出于黄帝,如《史记·三代世表》所记那样,所以也引起学者们的怀疑。

王国维《秦都邑考》说:“秦之祖先,起于戎狄。当殷之末有中湣者,已居西垂。”又说:“然则有周一代,秦之都邑分三处,与宗周、春秋、战国相当:曰

^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西垂’，曰‘犬丘’，曰‘秦’，其地皆在陇坻以西，此宗周之世秦之本国也；曰‘汧渭之会’，曰‘平阳’，曰‘雍’，皆在汉右扶风境，此周室东迁，秦得岐西地后之都邑也；曰‘泾阳’、曰‘栎阳’、曰‘咸阳’，皆在泾渭下游，此战国以后秦东略时之都邑也。观其都邑，而其国势从可知矣。”王国维这篇文章虽未具体论证秦人之来源，但其论都邑所得结论坚实不可移易，由其都对都邑变化的方面看，自然会得出“起于戎狄”的结论。后来之学者如蒙文通等从王国维之说，又找出一些证据。从文献方面说，《史记·秦本纪》中载，申侯对周孝王说：“昔我先，邠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湫。”中湫为嬴秦的正宗近祖。史所谓“邠山”即邠戎，则似中湫为戎人。《秦本纪》又明言中湫之父“戎胥轩”。《秦本纪》言“中湫在西戎，保西垂”，则从传世文献看秦人由西戎而来。而从文化遗存方面看，学者们认为嬴秦墓葬的洞室墓、屈肢葬式、葬品中多铲脚袋足鬲，皆与中原文化不同而多见于甘、青地区的羌戎文化。似由此也说明嬴秦来自西戎。

但也有学者主张秦人来自东夷。卫聚贤的《中国民族的来源》一文以为穀、黄、梁、葛、徐、江、奄等嬴姓之国原蔓延于山东、江苏及河南、湖北，而秦亦嬴姓，故谓秦民族发源于山东，后至山西、陕西、甘肃，然后再向东发展（《古史研究》第三集，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黄文弼《秦为东方民族考》（《刊《史学杂志》创刊号 1929 年）、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等主此说。黄氏并举鲁有“秦”地，及《楚辞·九歌》有“东皇太一”，前者名同于秦，后者与李斯所云“秦皇最贵”之说相合，为秦东来之证。徐先生在其书第二章《我国古代部族三集团考》之二《东夷集团》一节说：秦、赵“为殷末蜚廉的子孙西行以后所建立的国家”。第五章之《东西方的两种五帝说》一节也说到这个意思。但都是从华夏民族总的划分上笼统言之，未涉及到对文献中一些具体论述的解释。此后学术界或主“西方戎狄说”，或主“东来说”，均有理由，难以遽定。

“文革”后林剑鸣先生有《秦人早期历史探索》（《西北大学学报》1978 年第 1 期）、《秦起源于东方和西迁情况初探》（《求索》1981 年第 4 期）等。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马非百《秦集史》（中华书局 1982 年）也先后出版，两书均主“东来说”。段连勤有《关于夷族的西迁和秦嬴的起源地、族属问题》（1982 年《人文杂志·先秦史集刊》），后有韩伟《关于秦人族属及文化渊源管见》（《文物》1986 年第 4 期），并重申东来说，对一些问题加以梳理，以期解决一些疑问。如以为嬴秦墓葬的三大特征是秦人征服西北戎

族后戎族文化融入秦文化形成等。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在今甘肃南部礼县大堡子山出土大量秦早期铜器等,发现了大型墓葬和车马坑,时间当西周晚期,于是,又引起关于秦人起源的讨论。虽然在一些看法上仍然不一致,但这是在新的材料基础上的探究。可以说,此前各说都包含有部分的真理,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一些问题上学者们的看法更为明确,尽管结论完全不同,但都更接近于真理。先是王子今先生有《从玄鸟到凤凰——试探东夷族文化的历史地位》一文(《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5辑,1987年),后祝中熹先生发表《阳鸟崇拜与“西”邑的历史地位》(《丝绸之路》1996年10月“学术专辑”)。结合历史文献、礼县大堡子山一带出土大量文物及有关出土文物上的图案等,对有关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深入探索。接着,祝中熹先生的《秦人远祖考》、《秦人与西周王朝的关系》、《秦人早期都邑考》、《地域名“秦”说略》、《再论西垂地望》、《南岷北岷与西垂地望》、《大堡子山秦西陵墓主及其他》、《试论礼县圆顶山秦墓的时代与性质》等文,先后问世。

说来十分凑巧,祝中熹先生是山东人,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而到了甘肃,曾长期在礼县工作,他的夫人便是距发现了秦先公陵墓的大堡子山不远的盐官镇人,祝先生20世纪90年代初到甘肃省博物馆工作。他对山东、对甘肃有关文献和地理状况、民俗、文化的了解都极深,尤其对礼县一带大堡子山秦早期陵园、圆顶山秦贵族墓地出土器物及遗址形制都了如指掌,对礼县、天水、甘谷、张川、清水一带有关遗址的情况及出土先秦时器物也都了然于心。别的且不说,只这种人生经历,似乎便是“上天”派他来揭早期秦史一系列谜底的专使。祝中熹先生在专业上也十分痴心对历史文献的搜寻与研究,对前哲时贤之说极为重视。应该说,他的研究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行的,但当中不少具体问题的解决,一些细节的说明,仍反映出祝中熹先生对史实的深入了解及他个人独特的学术见解。在许多问题上,他提出了一些与前人、今人不同的创见。比如,他也主嬴秦东来说,但他认为其由东至西的时间远在尧舜之时。《尚书·尧典》中载帝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尧所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别去东南西北方测定节气,而羲和部族是少昊与颛顼的后代,是属于崇奉阳鸟的部族。《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言,少昊氏的“凤鸟氏”即为“历正”,玄鸟氏为“司分”,伯赵氏为“司至”,青鸟氏为“司启”,丹鸟氏为“司闭”。“分”指春分、秋分,“至”指夏至、